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
应奇 刘训练 主编

审判雅典 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

Jennifer Tolbert Roberts
[美]珍妮弗·托尔伯特·罗伯兹 著
晏绍祥 石庆波 王宁 译

ATHENS ON TRIAL
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九江学院图书馆



1829817

1517050

ATHENS ON TRIAL
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
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

[美]珍妮弗·托尔伯特·罗伯兹 著

晏绍祥 石庆波 王宁 译

不外借 B5/12928

九江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Copyright © 1994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 / (美) 罗伯兹著；晏绍祥，石庆波，王宁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11

(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

书名原文: Athens on Trial: 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

ISBN 978-7-5463-6823-8

I. ①审… II. ①罗… ②晏… ③石… ④王… III. ①思想史—西方国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5073号

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

著者 [美]珍妮弗·托尔伯特·罗伯兹

译者 晏绍祥 石庆波 王宁

出品人 刘丛星

创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策划 崔文辉

策划 猫头鹰工作室

责任编辑 周海莉 陈 媛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本 650mm×960mm 1/16

印张 31.75

插页 2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址 <http://www.jlpg-bj.com/>

邮箱 jlpg-bj@vip.sina.com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6823-8

定价：5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与致谢

xi

福柯以尼采《快乐的科学》为基础，将真理定义为“无疑属于那一类的错误：因为在历史长期的烘焙过程中，已经被硬化为无法改变的形式”。本书希望颠覆的，就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烘焙过程。

千百年来，雅典一直无可争辩地享有希腊世界艺术和思想中心的声誉，由于伯里克利对他的城市乃“希腊的学校”的描写深入人心，众多现代大都市为提升地位，将自己打扮成雅典人的文化后裔。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将他们的城市国家形容为第二雅典；维登堡把自己打造为“易北河上的雅典”；爱丁堡声称它是新雅典；波哥大自称“拉丁美洲的雅典”。在美国，波士顿称自己是“东北的雅典”；肯塔基的特兰西瓦尼亚学院已有意成为“西部的雅典”；亚特兰大和纳什维尔都已经宣称，它们是“南方的雅典”（尽管只有纳什维尔修建了它自己的帕台农神庙）。可是，对“希腊的学校”的利用，并不代表支持雅典人那无论是作为时空中独特现象的政府形式，也不表示会在其他时间和地点追随它。在整个西方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就其本身而言，臭名昭著。借用政治学家约翰·邓恩（John Dunn）的话说，在一个民主已经成为“今日民族国家制度的道德性通用标尺——一种所有民族都真正统一于其中的话语”——的世界上，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一旦民主原则与政府的合法性变成同义语，雅典人的民

主政治就在政治制度的万神殿中，被授予了一个享有巨大荣耀的地位。可是，我们不能据此想象，雅典人的政府会成为民主运动——在革命时代的欧洲和美洲，它积聚着自己的力量——的灵感。今天被视为合法化的祖先的古雅典，千百年来一直被排除在令人尊敬的政府之外。当然，现代的民主在把它们自己打扮成雅典人民民主政治的后裔时，很像一个先通过军事政变成为罗马皇帝，然后再虔诚地把它们自己过继到其祖先家族中的篡夺者。现实的情况颇为不同，认为尽管有雅典民主政治而非因为雅典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仍得以产生，就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想中，相当大部分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类的思想家。尽管他们反对雅典民主政治，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但在革命年代之前，雅典政府的声望中，少有可能刺激人们模仿它的东西，事情毋宁说相反，雅典更多是作为那类政府美德的反面教员，这些政府给予无教养的大众的权力，（较之雅典）少了很多。

xii

敌视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可溯源到雅典自身，它构成了本书的主题。我曾经自问，雅典政府为什么会成为如此众多非难的焦点？如果雅典政府其实不那么糟糕，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认为它那么恶劣？如果它真的像人们经常表现的那样可怕，为什么它的批评者会专门花费那么多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暴露其弱点？反雅典的传统始于阶级偏见，成长为具有自己生命历程的思想建构，已经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一个关键的构件。这个传统是怎么发端的？一旦发端，又是如何聚集起力量的？

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让我研读了用多种不同语言、在千百年中写就的一大批文献，因此需要就方法论说几句。第一，是一手资料对二手资料的问题。注释中引用的20世纪的学术著作，我明确地称为“参考书”，即某种“权威作品”，其与我分析的那些文献相互作用的方式，与我的有某种不同。当然，这样的分类非常随意，那些考察过这些现代文本的任何读者都可能，而且应该抛弃它。我个人探查人们思想来源的能力，受到普罗泰戈拉所发现的同样的因素——生命苦短，主题困难——的限制，它们阻止人们确信

神灵。如果我撰写一部关于希腊悲剧的著作，那我会引证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作品，我会参考卡尔·伦哈特（Karl Reinhardt）、查尔斯·塞格（Charles Segal）、海伦娜·弗雷（Helena Foley）和弗罗玛·蔡特林（Froma Zeitlin）的著作，所有人都明白，我会用非常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两类文献。正因为我是“所有人”中的一分子，我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我不曾写过一部关于希腊悲剧的著作，相反，我写了一本人们如何思考雅典的书，更宽泛地说，是他们如何思考政治和社会的书。当一个作者写关于思想谱系的书时，无可逃避的悖论是切断他或她与所有其他人的联系，因为如果尼可洛·马基雅维利、詹姆斯·麦迪逊或邦雅曼·贡斯当关于雅典的言论需要被置于其各自所在的语境中，那当然我本人的看法也必须被置于同样的语境中，但是，当我引用马克·胡里翁（Mark Hulliung）关于马基雅维利、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关于麦迪逊或者斯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关于贡斯当的著作时，就好像1900年以后的生日在某种程度上就保证了客观性和普遍性似的，那我在第十二章和十三章中对近来雅典批评的讨论，岂不清楚地表明我并不相信它们？为什么我不应首先研究马克·胡里翁、谢尔顿·沃林和斯蒂芬·霍尔姆斯的政治学，然后把他们写作其著述的方式解释为他们对这个世界进行的独特研究的产物？

答案当然是我不能，因为我会发现我自身陷于《美国学者辞典》的政治取向和20世纪高等教育史之中，而且我很快就会需要一个假期，去考察那些写过高等教育著述的人的政治观点的起源，再后来……现成的案例是弗兰克·特纳（Frank Turner）的《维多利亚时代不列颠的希腊遗产》，这是一部非常有思想的著作，对我的项目有巨大帮助。那些发现我追溯的思想史让人迷惑的读者，肯定希望阅读特纳的著述。特纳有关人们观察希腊理路变化的研究路径不同于我的，将来有人也许会写一部关于我们的书，将这些差异置于基本的哲学分歧的基础上，然后特纳和我，在各自树立了解释人们“思考希腊”的文本后，反过来又成了某个他人的解释对象，那实在美

xiii

妙。在扩展不断扩张的谱系框架中，我们只能尽我们的绵薄之力，下一阶段属于他人。如果某个学者在他的书或者文章中暗示我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作品，带有我的世界观的色彩，我会为成为如此的论辩对象而自豪。（这个承诺仅限于著作和论文，如果他们出现在敌视性的书评中，我不敢承诺我会为此等论辩感到光荣。）

第二，是与视角有关的问题。在《对历史的辉格党式解释》的“序言”中，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曾为许多历史学家“强调过去某些原则的进步，以创造一部进步即使不是荣耀，至少也是赞许当今的故事”的倾向伤心，我选择编织在一起的特殊故事，所追溯的是一条在我自己生活的时代达到其发展顶峰的发展，某种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可疑的“进步”之线。但在我衡量和抛弃了其他候选假设后，这就是我倾向于赞同的诸事件的面貌。我曾考虑写一本有些不同的书，某种质疑甚至否认“雅典民主政治”这个实体存在并拒绝区分对古代雅典国家或多或少有建设性研究理路的书，可是最终我确定，这种可敬的开放性的最终结果可能并不真诚。我的信念是：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有时会妨碍有关雅典的创造性思想，但它不应被作为我本人缺乏意识形态的暗示，也不应暗示我相信意识形态不好，或者说我考虑写一部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书。它也不意味着我暗示文明的进步就会自动有助于对过去进行更富思想性和开明的考察。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那本令人不安的书中，马丁·贝纳尔（Martin Bernal）已经论证：1815—1830年间，人们观察亚非文明对希腊发展贡献的方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他坚持认为，这一转变的结果，是对这一贡献不准确的估价，它为种族主义败坏。有意思的是，他发现的关键年代，恰好也是人们对雅典的态度发生最为戏剧性变化的时期。

第三，关于本书的范围我希望说上几句。总体上说，我避免考察些关于“希腊人”的一般性论述，除非我明显感到它们特指雅典人。基于同样的标准，我试图集中在将雅典与其他古代国家区别开来的结论上，因此，例如我没有深入考察诸如雅典人的世界观为前基督教的那些指控，我也尽可能

地限定在民主政治问题上，例如，我尝试围绕着政治含义来组织我关于现代雅典性别关系解说的讨论。我不曾讨论雅典政府在诗歌和视觉艺术层面的反应，也无法把古典戏剧中当时（古代的）对民主政治的零散讨论包含在其中。对最后一点，我有合理的理由，虽然是一个困难的说明，即总体上说，直到最近，悲剧的政治含义在有关雅典国家的思考中才发挥重要作用，就喜剧而言，阿里斯托芬的政治观点难以捉摸。在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与古代希腊》出版数年后，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yns）出版了一部有关维多利亚时代艺术中的希腊主题的著作，或许同样的命运也在等着我。

因为我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雅典本质上受到敌视性观察的时代，所以我对1850年之前的时期讨论相当深入，但不曾详尽论述20世纪学术著作中有关雅典的讨论。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让我无法逃离欧洲记者们有关雅典的辩论，他们或许和我在美国出版物中的讨论同步。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相当轻易地得到了诸如在法国和德国很难获得的资料，我阅读现代希腊语和俄语著作的缓慢，以及我对亚洲语言无望的无知，也让本书的范围有明显的局限。本书无奈地成为了一本很大程度上关于西方传统的著作。

第四，就我本人的话语略叙数语。我所说的雅典和“她的”政府乍一看是奇特的性别习惯。该习惯受到构成本书主题的传统的规定。尽管在雅典，妇女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进程之外，千百年来史学家们却一直这样写，好像雅典是个女性。此外，那些有关性别关系的著述通常在讨论“雅典人”对妇女的处理时，好像“雅典人”全是男性。更重要的是，20世纪之前，在回顾有关雅典政府的思想时，几乎没有关于妇女思想的证据（尽管希腊戏剧，其中既有悲剧，也有喜剧，提供了某些关于雅典妇女可能有信仰的某些令人好奇的暗示）。我讨论过的文献中，第一篇显然由妇女完成的作品属18世纪后期（让娜-玛利亚·罗兰，Jeanne-Marie Roland），只是在过去的大约50年中，才有相当数量的妇女留下了她们关于希腊历史意见的书面文件。因为本书追溯的是希腊传统，所以我把雅典称为“她”，并讨论“她的”政

府，有时似乎是合理的，尽管我本人没有理由相信国家会有性别之分。

除非特别说明，所有外文文献的译文都是我自己的。古典文献根据它们在《牛津古典辞典》（牛津1970年版）中出现的标准形态征引。

这里所表述的某些观点，在我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期刊论文中是有苗头的。在英国对雅典态度的问题上，读者或许会发现有些内容我已经在发表于《古典杂志》（第84卷，1989年，第193~205页）上的《雅典人在执掌权柄的岛屿上》说过了；发表于《古史通报》（第23卷，1988年，第9~53页）上的《特佩隆的帝国：切斯特·斯塔尔（Chester Starr）与提洛同盟的无懈可击》的部分内容在第十二章的各处再度出现；第六章的部分内容曾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佛罗伦萨人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观察》中，该文发表于《中世纪与人文主义》（1987年第15期，第25~41页）。

本书覆盖千百年，处理了不同语种的文献，其形成历时10年。10年之中，我欠下的人情比我开始预计的还要多。随着我的项目将我越来越拖离我的专业领域，我日益依靠学者们的善意，他们慷慨地拿出时间，运用最伟大的策略，以打击我对新奇假设的追求，因为它们的吸引力，超过了能够辩护的限度。

还是让我从头开始吧。本书表达的设想在1970年前后成型，当时我幸运地在耶鲁学院学习，两位导师是令人印象深刻但风格相当不同的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和彼得·罗斯（Peter Rose）。我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他们提醒我注意制约古典雅典研究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作为研究生，我对雅典的兴趣得到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鼓励，数年后，当我在达拉斯的南美以美派大学授课时，开始了本书的工作。在这些年里，我在南美以美派大学的同事们一直是多种不同形式支持的来源，本书从他们那里大为受益。单独提到某些具体个人总是危险的，但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丹尼尔·奥洛夫斯基（Daniel Orlovsky）和戴维·韦伯（David Weber）的建议和支持，他们那时先后出任系主任；杰里米·亚当斯（Jeremy Adams）不断为我注入能量和见解；彼得·奥诺夫（Peter Onuf）和爱德

华·康垂曼 (Edward Countryman) 指导我度过了对美国建国那个时期危险的考察; 唐纳德·涅维克 (Donald Niewyk) 让我避免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错误; 作为通识教育处的副主任, 詹姆斯·霍普金斯 (James Hopkins) 主动帮助我并让我享受了他办公室的舒适, 还有他作为系里同事的友谊; 詹姆斯·布瑞登 (James Bredeen) 的热心和智慧; 犹迪·摩拉兹 (Judy Mohraz) 毫不吝惜的慷慨; 丹尼斯·考德尔 (Dennis Cordell) 提出了好的问题; 路易·马丁 (Luis Martin) 因为他的路易; 托马斯·诺克 (Thomas Knock) 兄弟般的友情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未得到过的。对本系另一成员凯瑟琳·威尔曼 (Kathleen Wellman), 我也从她那里获得了深刻的个人和专业教益。虽然她一直愿意花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与我讨论文艺复兴和18世纪, 但我从她那里获得的主要益处, 是持续而长久的友谊, 尽管在我们俩都任教于南美以美派大学的八年中, 因为假期的交叉, 在一半时间里, 我们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不在达拉斯。

曾给我无价帮助的其他机构的同行们有很多。当1975年年初到维顿学院时, 我无知而充满热情, 那时我遇到了多罗莎·温德 (Dorothea Wender), 她享有这样的声誉: 把她遇到的人从无知者变成学者。罗伯特·罗兰 (Robert Rowland)、巴里·施特劳斯 (Barry Strauss) 和苏珊·威尔特夏 (Susan Wiltshire) 一直贡献着热情和智慧; 在那些非常善意地阅读过拙作部分章节并提出有益建议的人中, 我特别希望感谢迈克·阿特舒尔 (Michael Altschul), 欧内斯特·贝狄安 (Ernst Badian)、杰佛瑞·巴努 (Jeffrey Barnouw)、斯坦利·布斯坦因 (Stanley Burnstein)、威廉·卡尔德 (William Calder)、安东尼·莫罗 (Antony Molho)、马丁·奥斯特沃尔德 (Martin Ostwald)、卡尔·理查德 (Carl Richard)、理查德·维戈 (Richard Weigel), 特别是库尔特·拉弗劳勃 (Kurt Raaflaub), 他关于前面数章有思想且详尽的评论, 我极其感激。朱丽叶·弗劳德 (Juliet Floyd) 非常仁义地与我分享她对黑格尔的观察。在参加多个项目时, 我从沃德·布里格斯 (Ward Briggs)、艾琳娜·范塔 (Elaine Fantham)、约书亚·奥伯

(Josiah Ober) 和保罗·瑞 (Paul Rahe) 那里受益良多。

过去10年里，在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问题上，一个朋友和同事尤其向我提供了必不可少而且非常珍贵的见解。只要一个电话，唐纳德·拉泰纳 (Donald Lateiner) 就会成为无尽的鼓励和建议之源，还会有让人吃惊的丰富且有关的书目。他和玛丽安妮·加伯尔 (Marianne Gabel) 经常接到绝望的来电，却总是乐于提供那些准确的常识性方剂，对此我非常感激。

我在古代史学家协会的朋友们一直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本书从与他们多年来的同行交流中得益很多。我尤其希望向对本项目表现了特殊兴趣的几个成员致以谢意，他们是尤金·波尔扎 (Eugene Borza)、杰克·卡吉尔 (Jack Cargill)、弗里斯·库尔哈姆 (Phyllis Culham)、沃尔特·唐兰 (Walter Donlan)、弗兰克·弗罗斯特 (Frank Frost)、艾瑞克·格吕 (Erich Gruen)、犹迪丝·哈勒 (Judith Hallet)、杰瑞·林德斯基 (Jerzy Linderski)、文森特·罗斯瓦克 (Vincent Rosivach)、拉瑞·特瑞特 (Larry Tritle)、马尔莎·文森 (Martha Vinson)，以及阿伦·沃德 (Allen Ward)。无论是在协会的会议上，还是在美国各地和雅典举行的各种会议上，我都从出席者那里就本书部分内容的评论中，获得大量教益。

xvii 我尤其对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校园NEH雅典民主研究院会议的参加者深为感激，在那次会议上，查尔斯·希德瑞克 (Charles Hedrick) 非常客气地邀请我作为客座发言人，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

迈克·哈德逊 (Michael Hudson)、德鲁·哈林顿 (Drew Harrington)、埃利·萨甘 (Eli Sagan)、罗威尔·埃德蒙兹 (Lowell Edmunds)、摩根·汉森 (Mogens Hansen)、丹尼尔·托普金 (Daniel Tompkins)、弗兰克·特纳都非常仁义地给我提供了他们自己著作的拷贝。这些著作有些最近刚完成，有些还在进行中。它们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我的研究因为他们的合作进行得更加迅速。我特别感谢麦克·舒特 (Michael Shute)，他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初稿尚在进行之中，我就有幸拜读。我个人有关18世纪美国雅典民主接受的研究，如果迈克没有在1991年夏天故去，尚有许多

对话未能完成，或许会走上相当不同的道路。

彼得·欧本（Peter Euben）和艾伦·伍德（Allen Wood）不仅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审读了初稿，提出了无数有用的建议，而且在后来的讨论和通信中，大方地贡献着时间。我从两位那里得到的教益是巨大的。在本书进行过程中，该出版社的约安娜·希区柯克（Joanna Hitchcock）以她令人愉快的规律性，提供了急需的鼓励，本书的最后阶段，由于劳伦·奥本海默（Lauren Oppenheim）和劳伦·奥斯邦（Lauren Osborne）的辛苦劳动，而变得比较轻松。

10年来，如果没有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的慷慨帮助，本项目可能永远也难以完成，它提供的奖学金，使我在1984年夏天在佛罗伦萨进行研究；全国人文科学基金授予我1985—1986学年的大学教师奖金。我非常感谢南美以美派大学，它给我的两次学术休假以及夏季支持，让我能在意大利和法国从事研究，并返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1985年，我是该院的一员。在此期间，研究院提供了富有成果且让人珍惜的工作环境，我对此极其感激和喜爱。可是，如果没有克里斯提安（Christian）和弗瑞娅·哈比希（Freia Habicht）的好客，我在那里也许真的会感到孤单。

许多勤劳的图书管理员帮助了我的研究工作。我尤其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火石图书馆（Firestone Library）珍本图书部那些仁慈的人。由于他们的好客，我要感谢剑桥的马修·马兹曼（Matthew Maltzman），马里兰的爱娃·斯提尔（Eva Stehle），普林斯顿的罗莎莉亚（Rosaria）和艾瑞克·门森（Eric Munson），他们（除其他事情外）还让我得到了急需的在图书馆从事研究的机会；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非常大度地为我作了安排，让我在1990—1991年可以使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马克·兰多夫（Mark Randolph）和凯西·阿尔顿-托马斯（Cathy Alton-Thomas）在准备定稿过程中提供的各种帮助，也让我受益非常多。

如果没有达拉斯众多朋友的持续支持，要完成本课题是困难的，我尤其希望向下述各位致谢：保罗·克拉布瑞（Paul Crabtree）、维克·希尔

(Vicki Hill)、吉尔·尼尔森(Jill Nelson)、玛丽·里德(Mary Read)、马尔莎·萨兹(Martha Satz)和波尼·韦勒(Bonnie Wheeler)。其他地区的朋友和家庭也用多种不同的方式帮了忙。克里斯·罗伯兹(Chris Roberts)让他自己相信,人道的命运系于本书的完成,至少他让我相信他如此;佩奇·托尔伯特(Page Tolbert)理解了在培育思想的过程中“葱花饼”具有的重要地位;当我精神疲惫时,英格里德(Ingrid)和沃尔特·布兰科(Walter Blanco)总是不懈地鼓励,甚至让我在三人追逐赛中经常获胜。斯坦利·赫勒(Stanley Heller)总是提醒我,再没有其他书比本书更完美了。我的父母杰克(Jack)和艾琳诺·托尔伯特(Elinor Tolbert)在我1990—1991年的假期中,幸福地为我打开了祖屋(尽管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当我找到别的房子时,他们更为高兴)。在本书的最后阶段,我在纽约城市学院学生的活跃和好奇心,让人振奋而富有启发性。

在完成本书过程中,罗伯特·勒琼(Robert Lejeune)的支持必不可少。当我首次在曼哈顿的百老汇与第98街交会处的湖南餐厅遇到鲍勃(Bob)时,本书稿件的原始稿保存于13张磁盘中的39个文字之星文件,在CP/M操作系统中。他的帮助让我把这些分散的文件结合在一起,无情地把我的计算机知识提升到准专家的水平。他作为社会学家的见解,他对我疯狂的工作习惯的宽容,以及他的信心——尽管我那样,我会完成这本书,我对他的感谢,远非言辞所能表达。

缩略语表

<i>AJA</i>	<i>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i>
<i>AJP</i>	<i>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i>
<i>CJ</i>	<i>Classical Journal</i>
<i>CP</i>	<i>Classical Philology</i>
<i>CQ</i>	<i>Classical Quarterly</i>
<i>GRBS</i>	<i>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i>
<i>JHS</i>	<i>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i>
<i>QS</i>	<i>Quaderni di Storia</i>
<i>REG</i>	<i>Revue des Etudes Grecque</i>
<i>TAPA</i>	<i>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i>

目 录

序言与致谢	1
缩略语表	1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部 古典希腊

第二章 雅典的试验	27
第三章 对雅典民主的第一波攻击	65
第四章 民主政治与哲学家	96

第二部 摆弄过去

第五章 罗马人的改造	135
第六章 发掘希腊人	168
第七章 君主派与共和派	195
第八章 关于雅典和斯巴达的辩论	223
第九章 革命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	250

第十章 风水轮转	295
----------------	-----

第三部 近现代的改铸

第十一章 潮流的转向	323
------------------	-----

第十二章 雅典人与他者	361
-------------------	-----

第十三章 尾声：新与旧	413
-------------------	-----

精选书目	447
------------	-----

索引	461
----------	-----

第一章 导言

3

寻找世系不是要创建基础，恰恰相反，它扰乱了原本被视为固定的东西；让原来一体的东西破碎；暴露了原本被想象成一体的东西的多样性。

——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和历史》

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倨傲的雅典贵族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因面临反对国家支持的宗教等多项渎神罪的严重控告，叛逃到敌人那边。修昔底德（Thucydides）坚称，一旦到达斯巴达，为获得斯巴达对他的接受，阿尔西比亚德就强调，他对雅典政治的积极参与，并不真的表示他支持雅典民主政治。他论证，那是“公认的蠢举”，所有理智的雅典人都承认，那是愚蠢。

这个说法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阿尔西比亚德关于良好理智的标准肯定是主观的，即使我们能够分出谁理智，谁不理智，但我们仍无法对那些死去的雅典人进行统计，看理智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然而有一点是明显的：阿尔西比亚德的某些最为耀眼的同时代人说了他们自己国家政府的坏话，例如修昔底德、柏拉图和阿尔西比亚德的老师苏格拉底，而且在阿尔西比亚德死后，这项工程得到一个著名的过继的雅典人的支持，他是亚里